

Culture and Poetics

文化与诗学

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学术思想

2016年第2辑 总第**23**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〇编

李春青 赵 勇 〇主编

赵 勇 〇执行主编



上海市
出版
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文化与诗学

(2016年第2辑)

主 编：李春青 赵 勇

执行主编：赵 勇

编 委：曹卫东 陈太胜 程正民 党圣元

黄卓越 李春青 罗 钢 钱 翰

钱中文 陶东风 王一川 赵 勇

周启超 周小仪（按音序排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诗学·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学术思想 / 李春青, 赵勇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675-6925-6

I. ①文 ... II. ①李 ... ②赵 ...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童庆炳—学术思想
IV. ①G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7181 号

文化与诗学·2016 年第 2 辑 总第 23 辑

主 编 李春青 赵 勇
执行主编 赵 勇
责任编辑 任红瑚
封面设计 淡晓库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6 开
插 页 1
印 张 20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925-6 / G · 10621
定 价 6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学术思想

拓展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	程正民	002
审美意识形态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结晶		
——纪念童庆炳先生·····	张弓 张玉能	012
文化诗学·行为结构·历史化·····	马大康	018
文化诗学的接受之维·····	黄键	042
文化守望的诗性逻辑		
——中国“文化诗学”与英美“文化研究”的比照探讨·····	黄春燕	064
文化诗学的文化意义·····	沈金耀	074
从文论格局看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	江守义	086
文化诗学：整合与建构中的中国文学理论方向		
——论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的内涵·····	杨红莉	102
论《文心雕龙》的“现代阐释式”研究·····	方锡球	114
古典新义：童庆炳古代文论研究范式辨析·····	杨宁宁	136
论童庆炳的“审美溶解说”·····	江飞	146
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文学理论研究		
——以童庆炳为个案·····	魏英	157

志足而言文 情信而辞巧

——试析童庆炳《又见远山，又见远山》……………王 茹 175

独异问题讲演录

独异问题导论

——兼致中国听众……………塞缪尔·韦伯著 赵天舒译 李 莎校 186

文学认知的独异……………塞缪尔·韦伯著 苏 岩译 郭 佳校 201

感觉军事化：进行一场“反恐战争”意味着什么？

……………塞缪尔·韦伯著 党文亭译 曾子涵校 222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

怀旧、现代性与另类公共空间

——20世纪80年代露天电影的文化研究……………刘 剑 244

译制片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心理诱因考察

——以日本译制片为中心……………魏建亮 264

普通话、广播与20世纪80年代当代大众文化的生成……………贺滢波 282

快感与自卑感的循环

——试论网络玄幻小说中的升级问题……………耿弘明 295

编后记……………313

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学术思想

拓展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

程正民^[1]

〔摘要〕 童庆炳所倡导、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所致力文化诗学，是对新时期文艺学的反思和超越，是对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文化诗学所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一种人文情怀和一种科学精神的融合。文化诗学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文化是民族的魂魄、血脉和基因，民族文学和文论是树，民族文化是根，文化诗学应十分重视文学和文论同民族文化精神的血肉联系的研究；二，文学的形式如何折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如何内化为文学的形式，最终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历史和结构的融合，外部和内部的贯通，这是文化诗学从理论上和时间上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童庆炳 文化诗学 民族文化精神 文学形式与文化语境的互动

文化诗学是童庆炳倡导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理论创新是对新时期文艺学的一次深刻反思和大胆的超越，也是对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

文化诗学理论自1998年由童庆炳提出，近20年来他和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同仁一直致力于这项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教研室开设“文化诗学专题”课程，由六位教授共上这门课，后来又承担与文化诗学相关的“文艺学

[1] 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教学和研究双向拓展”的教改课题。进入 21 世纪，文艺学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 10 卷本的《文化诗学丛书》，5 卷本的《文化诗学丛书》，以及《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丛书》，同时召开了全国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更重要的是，大家十分重视运用文化诗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外文论和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论文写作，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著和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受到业界的重视和赞扬，文化诗学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而且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就童庆炳本人来说，直到重病缠身的最后几年也一直坚持文化诗学理论研究。《童庆炳文集》第 10 卷《文化诗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他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总结，是他文化诗学研究的绝唱。书中有理论分析，更加强了个案分析，而且突出了文学文本和历史文化的互动、互构的研究，用了好几章的篇幅分析了文学语言、抒情话语、文学叙事、文学修辞同社会文化的互动及互构关系，把文化诗学研究引向深入。

童庆炳倡导的文化诗学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要以审美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指文学研究既要伸向微观的文学文本的细部，又要伸向宏观的文化历史观照。这种文化诗学是一种有人文情怀的文艺学，是一种有科学精神的文艺学，是一种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相融合的文艺学。

文化诗学是一种有人文情怀的文艺学。

有两种文艺学：一种是书斋式的，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一种是贴近现实，关怀人生。童庆炳的文化诗学属于后者。面对社会的重大变革，面对社会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他认为文艺学家不能置身度外，要通过文学理论批评发出制衡的声音。文化诗学要通过张扬审美，张扬“诗情画意”，去对抗现实的丑恶和庸俗，要通过文化的元素和视野介入现实，与现实保持紧密的、生动的联系。

我们不主张把诗学当作思想斗争的工具，但诗学既是人文学科，就理应具有人文精神，就理应深切地关怀人生。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文学理论家的文学理论都是贴近现实、关怀人生的。别林斯基的人民性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都充满对俄罗斯现实和俄罗斯人民命

运的深切关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也是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对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的思考。童庆炳也应当属于这些文学理论家的行列。

文化诗学又是充满科学精神的文艺学。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走过了艰辛的、曲折的道路，在摆脱了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学，教条主义的文艺学之后，文艺学家一直在探索文艺学发展的道路，文学研究结束了文艺社会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文学研究从一元走向多元，大家试着运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文学。诚如巴赫金所言，“文艺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而文艺学又过于年轻，所以还很难说，文艺学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因此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化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更加深刻的理解。”^[1]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界从审美诗学、心理诗学、语言诗学、文体诗学到文论诗学，一路走来，确实十八般武艺都试过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文艺学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当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运用不同方法和角度来研究文学，而是这些不同方法和角度之间是什么联系。童庆炳提出的文化诗学，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说它是对新时期文艺学的反思、延伸和超越，我的理解就是它要解决多种方法、多种角度、多种诗学之间的联系的问题。且不说这些不同的方法、角度和诗学能不能整合成一个东西，能不能整合出一付解决文艺学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们之间如何联系、如何融合，如何“互动、互构”，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这正是童庆炳所倡导的文化诗学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也是它的理论价值之所在，因为它涉及文艺学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童庆炳所倡导的文化诗学是他留给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的一份宝贵的理论遗产，留给文艺学界的一份宝贵的理论遗产。他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文化诗学的研究并没有结束，有许多问题还有待我们做出新的阐释，做出新的探索。我们怀念他、纪念他，不仅要继承这份理论遗产，更需要进一步发扬

[1]《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366页。

和完善这份理论遗产，进一步拓展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其中我认为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一是文化诗学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关系，一是文学形式和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

先讲文化诗学同民族文化精神的关系。

文化诗学强调文学研究要有历史感，要重视历史文化语境，要有宏观的历史文化视野，这是文艺学的一大进步。以往的文艺学要么是把文学同社会政治经济直接挂钩，忽视文学的特性，要么是在强调文学特性后又忽视文学同社会文化语境的联系。文化诗学在强调文学审美特性的前提下，在文学同社会关系上特别强调同文化的关系，依我看，这是把文化当作是文学同社会政治经济联系的桥梁和中介，也就是说社会政治经济是通过文化作用于文学的，这就大大突出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巴赫金所说的，关注文学特性是必要的，但狭隘的专业化又是同俄罗斯优秀的学术传统格格不入的。他说，“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该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1]

文化诗学强调重视文学的文化语境，这是十分正确的，然而文化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是民族的魂魄，民族的血脉，民族的基因。先有民族文化后有民族文学和文论，民族文化是根，民族文学和文论是树，先有根才有树。因此，文化诗学应当十分关注文学和文论同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精神的血肉联系，不能满足于一般地深入文化语境，而是要进一步深入民族文化语境、民族文化精神，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理解文学和文论的精髓和深刻的内容。就拿俄罗斯文学和文论同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的关系来说，鲁迅指出俄罗斯文学始终散布着一种“销魂的广漠和哀愁”，或可称之为“淡淡的哀愁”。而这种基调和氛围的形

[1]《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成是同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是受农奴制压迫而形成的关注社会人生的思想文化传统。赫尔岑就说过，“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人民倾诉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1]卢那察尔斯基也指出，在俄国专制警察制度下，文学和文学批评就成了抗议专制和呼唤自由的气门，成为社会激情和先进社会思想的气门，“所有一切社会激情通过这个气门直冲出来。”^[2]二是由浓厚的宗教情怀所体现的人道思想和救世思想。别尔嘉耶夫说过，“俄国人民的灵魂是由东正教教会所培育的，它具有纯粹的宗教形式。这种宗教形式一直保存到现在，保存到俄国的虚无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身上。”^[3]以上谈到的这些俄罗斯文化精神渗透到俄罗斯文学和文论之中，就表现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一种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淡淡的哀愁。俄罗斯文学和文论同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的关系如此密切，中国文学和文论同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密切。受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影响的文学和文论，把文学和文论看成“经国之大业”，强调它的政治作用和道德教化作用。受道家思想文化影响的文学和文论则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观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品格。同时，不同思想文化传统又是相互渗透的，这就构成中国文学和文论绚丽多彩的面貌。

再讲文学文本形式同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

自从有文学理论以来，如何理解和处理文学研究中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的关系，一直成为文艺学家长期纠结的大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童庆炳所倡导的文化诗学就触及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提出“双向拓展”，提出文学研究既要有宏观的文化事业，又要有微观的文本视野、语言视野。后来又称之“两个基本点”。在理论上这有很大进展。但这两个方面如何联系，如何结合，一直还没有从理论上和时间上加以深入的阐释和解决。童庆炳在后来似乎也意

[1]《赫尔岑文集》第7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8页。

[2]《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吴谷鹰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3页。

[3]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由来和意义》，俄文版，1990年，第8页。

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难度，于是他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还是花了很大精力，下了很大功夫，深入思考和阐释这个问题。在《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1]一书中，他在“双向拓展”和“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形式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互构问题”，并且具体阐述了“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抒情话语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文学叙事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文学修辞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等问题。其中，关于“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他说，“文学语言在具体作品中作为文本而存在，它总是与社会文化形成一种‘互文性’的对话关系。要揭示文学语言文本的文化意义，重要之点是重构语境，要把文学语言文本放到语境中去把握。不但要放到‘文内语境’中去把握，还要拓展语境，放到‘文外语境’中去把握。文学语言文本受社会文化文本制约，它同时又丰富了社会文化文本，形成新的社会文化景观。所谓‘互动’‘互构’就在这种‘制约’和‘丰富’过程中。”^[2]从“双向拓展”“两个基本点”到“互动、互构”，童庆炳的文化诗学研究应当说是大大向前推进了。尽管如此，文学文本形式与社会文化语境如何结合，如何互动，如何互构，仍有理论空间可以开拓，仍然需要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探讨。

这里我想谈谈俄罗斯文艺学家的一些思考，为考虑这个问题提供一种理论参考。童庆炳在谈到文学文本形式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时，曾多次谈到巴赫金关于文学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关系的论述，谈到普洛普关于故事形态和故事文化历史根源关系的论述。我本人写过《在历史与形式之间——考察 19~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的视角》^[3]，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形式和社会历史文化关系这个理论问题。

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一直存在文学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历史、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纠结，不少理论家和批评家始终游走于两者之间。19 世纪有别、车、杜的社会历史批评，也有法鲁日宁等人的审美派

[1] 《童庆炳文集》第 10 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2] 同上，第 220 页。

[3] 程正民：《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7 年版。

批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现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之后,仍然出现只讲政治、经济不讲审美的庸俗社会学和只讲形式不讲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形式主义这两种极端。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同文学研究对象本身就具有形式和内容、结构与历史、内部与外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也同时代因素和研究者的个性相关,不同时代侧重不同的方面,不同研究者也侧重不同的方面。

20 世纪以后,俄罗斯不少后来具有国际声誉的文艺理论家开始对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历史、内部与外部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俄罗斯心理诗学的代表人物维戈茨基(1886—1934),在其《艺术心理学》(1925)中,既批判了把艺术理解为手法的形式主义,也吸收了形式主义的有益成分。他特别强调形式的重要性,认为“艺术开始于形式开始的地方”,“艺术作品只有在它既有的形式中才能发挥它的心理影响。”^[1]他的核心观点是:“从艺术作品的形式出发,通过对形式的要素和结构功能分析,说明审美反应和确立它的一般规律。”^[2]他试图通过分析作品的内在矛盾来解释审美反映的心理机制,将形式结构分析同审美反应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普洛普(1895—1970),在他的《故事形态学》^[3](1928)中,着眼于故事文本形式,揭示故事构成的要素和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归纳出神奇故事的 31 种功能和 7 种角色,第一次从故事内部生成规律的角度回答故事是什么的问题。但他仍不满足于故事的结构形态研究,继而又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4](1946)中,解答了故事从何而来的问题,阐释故事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力求将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俄罗斯结构主义诗学的代表人物洛特曼(1922—1993),在《艺术文本的结构》^[5](1970)等著作中,指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系统和符号系统,艺术文本就是艺术信息的载体,艺术文

[1] 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1、43 页。

[2] 同上,第 27 页。

[3] [俄]普洛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4] [俄]普洛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5] [俄]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王坤译,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本结构越复杂所传达的艺术信息就越丰富，比如诗歌的韵律、节奏、词语以及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之间对比、对立、重复，都会传达出丰富的信息和意义。更重要的是，洛特曼还进一步提出艺术文本结构和外文本结构的概念，认为艺术作品除了文本还包括外文本的种种因素，如现实生活、文学传统、历史文化等等，要理解艺术作品的文本结构，还需要理解更为复杂的外文本结构。他在回答结构诗学是“反历史主义”和“去人文化”的指责时说，“现在已经很清楚，当我们与复杂结构（艺术就是属于此类结构）打交道时，由于此类结构的多因素性，进行共时态描述一般说是很困难的，了解此结构的先前状态，是对结构成功进行模式化的必要条件。因此，结构主义不是历史主义的敌人，不但如此，懂得将单个艺术结构（作品）当作更为复杂的统一体的成分，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而这个更为复杂的统一体就是‘文化’‘历史’。”^[1]

在文学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历史、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系统深入的阐述和精彩分析的当属巴赫金（1895—1975）。巴赫金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人物，各种诗学流派到他这里达到一种整合，得到一种健康的发展。他既反对将文学等同于政治、经济的庸俗社会学，称它为“非诗学的社会学”，也反对脱离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来谈文学特性的形式主义，称它为“非社会学的诗学”。他认为文学是多面和复杂的现象，主张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文学，并且强调要重视多种方法的联系，在它们之间达到一种融合。从理论层面看，巴赫金有两个观点值得重视。一是“文学内部和外部辩证统一论”。针对“艺术结构的内部非社会性”的观点，他认为每一种文学现象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而外部因素必须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2]同时，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也是相互转换的。^[3]二是“文学内在社会性论”，他认为“任何文学作品本身内在都具有社会性，作品形式的每一要素无不渗透着活生生的社

[1] [俄] 洛特曼：《文艺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文学问题》1967年第1期，第94页。

[2] 《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3] 同上，第146页。

会评价”，因此，应当把艺术结构的每一要素看作是社会力量的折射点和结晶体。^[1]从实践层面看，根据内部外部统一论和内在社会性论，在研究文学现象和分析文学时，巴赫金主张从形式切入，从体裁出发，他说，“诗学恰应从体裁出发”。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形式是意味的，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不是通过作者的言论，不是通过作品人物的言论表现出来的，而应当通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而艺术形式新的变化会给艺术内容带来崭新的面貌。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果戈里的《外套》作比较，巴赫金认为两篇小说写的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下层小人物，“内容并没有什么变化”，但“作品各结构要素之间如何分配，情形就会全然不同”，也就是说，小说的艺术视觉和艺术重心发生了变化了。《外套》是独白小说，主人公是由作者控制的。《穷人》是复调小说，作者对主人公采取全新的立场，作者不再控制主人公，主人公不是按照作者的眼光，而是按照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这里强调的是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这种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体裁的创新，恰恰展示了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的重大变化，小人物形象自我意识的增长。巴赫金说，“整个艺术视觉和艺术结构的中心转移了，于是整个世界也变得焕然一新，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没有给作品带来什么真正新鲜的、为果戈里所无的材料。”^[2]在这里，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的创新是完全一致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是融合的，艺术结构和历史内容是融合的。

不论是巴赫金也好，童庆炳也好，他们对于文学文本形式和社会文化语境关系的探索，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文学批评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克服了以往把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当成两张皮的现象，把两张皮变为一张皮，力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历史和结构的融合、外部和内部的贯通，使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出现新的面貌。例如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写作中，就

[1] 《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2] 同上，第64页。

自称受到巴赫金的影响，受到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1]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从形式切入，走向形式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融合，而不是像一般人所做的那样，“从意识形态推寻文学形式的变化”，而是想“从文学形式窥探到意识形态的变化”。他学习巴赫金的研究方法，在专著中不是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社会运动来论证小说形式的变化，而是“从小说特征的一点一滴的变化，是窥探、折射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也就是说，把小说形式看成社会历史文化的折射和结晶、从小说形式变迁切入，讨论 20 世纪中国意识的变化，把形式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这就真正沟通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1] 陈平原：《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中华读书报》2003 年 3 月 5 日。

审美意识形态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结晶^[1]

——纪念童庆炳先生

张 弓^[2] 张玉能^[3]

〔摘要〕 本文认为以童庆炳先生为代表所创立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结晶，虽然还有待完善，但是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原理的，也是符合文学艺术实际的文学原理。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是在一个层面上把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这是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论述为依据的。其次，毛泽东思想文论也是把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来界定的。再次，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结晶。对于“审美意识形态论”这样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当代就只应该加以完善，而不是要加以完全否定。这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才能够在中国当代多元化、开放性的文艺理论发展态势之中健康发展壮大，对整个世界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应有的贡献。以此文纪念童庆炳先生。

〔关键词〕 审美意识形态论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 童庆炳 理论结晶

[1] 本文写作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学’语境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编号11CZW017）资助。

[2] 张弓，美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文化研究。

[3] 张玉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